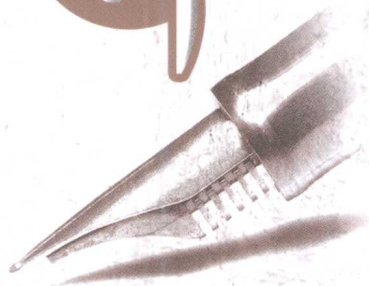


译坛异军

创造社
翻译研究

咸立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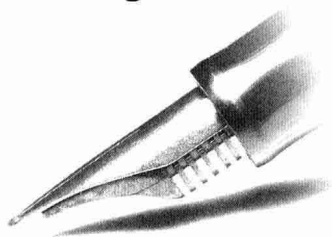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译坛异军

创造社
翻译研究

咸立强/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林 敏

装帧设计:艺和天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咸立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01-009097-9

I. ①译… II. ①咸… III. ①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6845 号

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

YITAN YIJUN CHUANGZAO SHE FANYI YANJIU

咸立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60 千字

ISBN 978-7-01-009097-9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不仅仅是翻译

袁国兴

近一百多年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域外文化和文学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沟通 and 理解,成为了时代的显学。在这个过程中,广义和狭义的“翻译”问题,可能是最先被人遭遇到、也似乎是最难被人参透的问题。早在中国人刚刚与外来文化接触时,人们就意识到了:“泰西之于中国,亘古不相往来,即一器一物,亦各自为风气。有泰西所有,中国所无者;有中国所有,泰西所无者;有中西具有,而为用各异者。”在“国不一国”的条件下,“兼通之难”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①可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拿来主义”态度,富于创造性的进行着不间断的现代转型——现在也仍然还在继续着这一艰难的进程。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关系,就可能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怎样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那么,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关系探讨也就成了“无米之炊”和无本之末。翻译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戚立强博士从社团流派视角切入的这一选题,关涉的层面多,遇到的问题多,可供阐发的理论资源也不少。创造社同仁不是最早关注文学翻译问题的群体,但在相关领域却是最容易引起争议和麻烦、相比较而言也容易把问题引向深入的群体。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现代各文学社团中,创造社成员的文学感悟能力和“纯文学”热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创造社成员也富于“打架”气息、善于“挑起是非”——这两方面因素都使得他们成为探讨中

^① 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1897年5月12日《时务报》。

国现代文学翻译问题的一个有利的观照点。

我们知道,在现代各种文类和文学体式中,诗歌的翻译显得尤为困难,因此有人甚至认为“完全的译诗是根本不可能的”。^①近百年来,自从中国人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伊始,有关争议似乎一直就没有间断过。本书的题旨是研究创造社的翻译问题,而研究创造社的翻译躲不过译诗这道坎,探讨对象的素质逼迫着研究者(或者说鼓励研究者)不得不知难而进。如果说在这种选择中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的话,那么恰恰是因为通过对这些困难的克服,才有可能让探索更加接近于问题的核心和实质。作者在本书中直面了诗歌的可译和不可译的二律悖反矛盾,指出:“西方翻译理论逐渐由原文与译文的对等,走向阅读效果的对等,也就是说,研究的重心由以原著中心转向了以读者(接受者)为中心。郭沫若提出‘风韵译’的翻译观,追求的便是翻译的‘动态对等’,从信息接受者的角度提出的翻译要求。”这样的一些探讨,已经不仅仅是探讨翻译问题了,还关涉到对“诗之本性”的一些基本理解。中国古代早就有“诗无达诂”之说,也有“离形得似”的艺术主张,对母语的“诗”和文学的理解尚且如此,对翻译的作品怎么能要求它原版复制?如果真的这样,还有翻译的价值吗?本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颇具一般性的理论穿透力。

狭义的翻译是有关语言沟通的一种实践,文学翻译虽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需要兼顾,但语言学视角上的“等值”和“对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层面。当然,这也是本书作者花费精力较多、相对也贡献较多的一个领域。对于不同译作间的艺术取舍,对于一词、一音的辨析,没有相关的外语知识和外语能力则做不到这一点,没有对母语文学的深厚积累和艺术体验也做不到这一点。关心翻译问题的学者,自可以从本书中发现一些翻译的论题;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可以从中体察出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迹象。我以为,当下的翻译文学研究热,决不仅仅是因为翻译作品的需求和翻译实践的拉动,还与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深入和频繁的、跨语境文化交流趋向有关。显然,这既是本书作者学术追求的一个潜在动因,也是保证本书具有一定思维意识张力的必要条件。

据我所知,本书是作者关于创造社研究的第二本著作,此前的积累和研

^① 徐志摩:《我歌的一首诗》,1924年11月7日《晨报副刊》第265号。

究为他的这一选题的完成提供了帮助。本书史料掌握充分而详实,论述缜密,细节丰满。它是有关创造社的“翻译”研究,也是有关“创造社”的研究。这是本书与学界其他研究翻译问题著作有所区别之所在,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所在。

在本书出版前,我有幸浏览了全部书稿,自觉收获颇丰。虽然翻译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文化蕴涵的深厚,使得任何一种有关翻译研究的著作都会给人留下一些相应的话题;但我以为,与本书的所谓“成就”和“不足”比起来,像咸立强博士这样耙梳了大量史料,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态度,更值得珍视。

2010年元旦日

序——不仅仅是翻译 袁国兴 / 1

导言 / 1

一、创造社翻译研究的对象与范畴 / 1

二、创造社与中国现代文学翻译 / 10

三、创造社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 / 18

第一章 创造社译介活动的历史进程 / 27

第一节 个性之窗:初期创造社同人的译介活动 / 29

第二节 象征之风:中期创造社同人的译介活动 / 53

第三节 马列思潮:后期创造社同人的译介活动 / 69

第二章 在对立与冲突中确立自身的译坛异军 / 95

第一节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 / 95

第二节 创造社与胡适的翻译纠葛 / 141

第三节 创造社与鲁迅的译介分歧 / 151

第三章 创造社三鼎足的翻译观 / 173

第一节 郭沫若的译诗观 / 173

第二节 成仿吾的译诗观 / 182

第三节 郁达夫的翻译观 / 187

第四章 创造社翻译的互文性研究 / 197

第一节 《流浪者的夜歌》的翻译 / 199

第二节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的翻译 / 208

第五章 郭沫若与《鲁拜集》的翻译 / 219

第一节 互文性与《鲁拜集》的翻译 / 223

第二节 郭沫若与胡适译文比较 / 239

第三节 从《鲁拜集》的翻译看翻译标准的量化问题 / 248

参考文献 / 257

后记 / 259

导 言

一、创造社研究的对象与范畴

创造社在现代文坛上之所以能够异军苍头突起,特别引人注目,与他们四处挑衅、猛烈的批评活动有关。初期创造社同人通过“打架”^①的方式在现代文坛上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现代文学新的发展路径。犀利的文学批评与翻译批评,四处挑衅的姿态最终还需以实力作为后盾,否则,四处挑衅与猛烈批评的行为只能徒然成为别人的笑柄,难以产生真正的、深远的影响。其实,以“骂人”、“打架”形式出现的批评活动(包括翻译批评)只是初期创造社同人亮相文坛,争取自身生存空间的一种话语策略,真正显示他们实力,使整个现代文坛都无法忽略创造社这一文学社团存在的,还是他们自身卓异的文学创作与译介实绩。

从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在日本东京改盛馆郁达夫的寓所里正式成立之时算起,直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时为止,创造社前后近十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译介实践始终都是创造社同人热衷从事的事业,是文学社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创造》季刊创刊伊始,创造社便将翻译批评作为自己追求的一项重大文学事业,几乎每期都以专文或书信或小说等形式进行翻译批评,提出自己的翻译理想,指摘现代翻译的病瑕。继《创造》季刊之后所创办的《创造周报》,“更是将重点放置在了评论和翻译上,它在创刊之初就侧重于文学翻译栏目的设置,全年五十二号之中除第七、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八、五十一、五十二号外其余每期都出现过文学翻译的文章,像第十一、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六、三十七号除了几篇并不重要的通信和杂感外,其余全部都是有关翻译文学的,这也几乎可以算是文学翻译专号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利用《创造周报》在中国第一次完整地译介了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第一部,这也在青年读者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就外国文学翻译问题,《创造周报》也分别在第十号 and 第三十七号刊登了郭沫若的《论翻译的标准》和《古书今译的问题》,这样《创造周报》对于文学翻

① 最早使用“打架”一语描述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争的是瞿泉(汪馥泉),语见《“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底提议》(1922年11月11日《文学旬刊》第55期第3版)一文,后来成仿吾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回应文字中也使用了这个字眼。

译从实践到理论也逐渐加以提升。另外像郭沫若《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瓦特裴德的批评论》、《惠施的性格与思想》等外国文学作家和文艺思潮的译介更是令广大读者耳目一新。”^①翻译与创作一起筑就了创造社辉煌的文学事业。与创造社文学创作有些虎头蛇尾的发展趋向相比,译介实践始终都是使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占据时代前沿,引领文坛潮流的利器。

在研究创造社翻译文学及其译介实践时,视野就不能仅仅集中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创造社正式成立至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这个时间段内。毕竟,所谓创造社的正式成立与最后的被查封,只是文学社团存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作为一个越来越具有组织意识、甚至被视为“最有组织”^②的社团,也不是政府的一纸封条便宣告烟消云散,不复存在的。社团是由人组成的,创造社同人的译介实践早在创造社开始之前就已进行,而在创造社被查封之后仍然在延续,从人事的角度说,社团的正式宣告成立和被查封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结成创造社的同人们就已经在进行一些团体性的活动,而在社团被查封之后,创造社同人也仍然依托其他的途径进行着一些团体性的活动。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创造社翻译文学及译介实践活动,在时间范围上应该是以正式成立到被查封这一段时间为重心,适当地向前后相关时期延伸。其实,这一判断也与实际情况相符,一些早于或晚于创造社存在时间的译介实践,有时也被冠以创造社的名目,比如《茵梦湖》的翻译,歌德《浮士德》等的翻译,皆在创造社成立之前就已开始,而正式出版却是在创造社登台亮相之时。另外,有些创造社成员如田汉等,当时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比参加创造社还要早),田汉翻译的《哈姆雷特》和《莎乐美》都发表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中国》上,对于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是否还将其归入创造社译介研究的范围之内……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因此,在研究创造社同人译介实践活动时,不得不考虑译介实践的延展性,只有如此,才能将一些译介实践发生及其进行置入相应的文化背景、动力因素及其表现出来的独有的时代特征中给予恰当的考察。作为一个以友谊为基础的文学社团,我们应该以核心人物的聚合离散作为社团内在活动

① 张勇:《“球形天才”是这样形成的——前期创造社期刊创办与郭沫若早期的文学创作》,《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463页。

② 贺玉波:《革命文学家郭沫若》,《致文学青年》,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版。

的根本。如此一来,我们起码要将研究的视野上限追溯至一九一八年创造社筹备期,至于下限,起码在“左联”时期创造社同人的一些活动(“左联”囊括了创造社很多成员,其他不在“左联”的成员在三十年代的译介活动也需要囊括进我们的研究视野),我们也应该囊括其中。我们拓展研究视阈的目的当然不只是简单地扩大研究的对象范围,而是要将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在这里主要是译介活动)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进行研究,不至于断章取义,造成不应有的盲点。

创造社同人共有五十二位: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穆木天、何畏、陶晶孙、张定璜、徐祖正、王独清、邓均吾、方光焘、滕固、周全平、洪为法、叶灵凤、潘汉年、敬隐渔、倪貽德、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严良才、徐耘阡、邱韵铎、梁预人、漆树芬、蒋光慈、徐葆炎、段可情、黄药眠、周灵均、赵其文、张曼华、苏怡、阳翰笙、李一氓、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沈起予、王学文、许幸之、沈叶沉、傅克兴、王敦庆、白薇、龚冰庐。外围同人十二位:陈尚友、叶鼎洛、冯沅君、赵伯颜、白采、楼建南、张友鸾、何道生、曹石清、窃窃、顾仁铸、汪宝瑄。^① 由于外围同人基本没有译文或与翻译相关的文章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也没有参与过与创造社相关的翻译问题讨论,是以研究的范围可以缩小到五十二位创造社同人身上。当然,我们不必也不能一一讨论每个创造社同人的翻译实践及其翻译理论,毕竟有些同人的译介活动量少之又少(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而且又有很多译文根本不注明原文的来源,而且有时可能还是改译或编译,使我们的研究除了说明这位成员曾译介过此文之外,别无更进一步的研究门径。对于像郭沫若那样的翻译大家,我们也只能选择某些译文进行具体的研究,不可能对其翻译成果进行面面俱到的研究,那是本书的框架无法容纳得了的巨量内容。在团体与个人之间,我们只能选取一些适当的平衡点,带着问题意识去研究某些关键的点,通过这些点去透视团体和个人译介方面的成就、特色及其优劣。另外,随着时间的流逝,译者水平的高下已经非常显豁,对于一些粗糙的译文,我们现在的研究也只能进入文化研究的层面,而真正值得深入全面地进行探讨的对象,可说寥寥无几。因此,在行文中,我们将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既从整体上全面梳理创造社翻译实践的流变,又结合一些典型

^① 创造社同人及外围同人的确认问题,请参照咸立强:《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11页。

个案,揭示创造社翻译文学及其实践的特色、价值与意义,力求详略有序地勾勒出创造社的文学译介地图。

创造社同人的译介活动,丰富异常,既有将西方文学译介到汉语中来的实践,也有将自己创作的英文、法文著作翻译成汉语的实践,比如郭沫若一九二二年七月三日作的《辛夷集·小引》,原为英文无韵律诗稿,后改译成中文,《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原稿也是英文。郭沫若自己说,“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在本月二十五日要出一次英文的《支那研究专号》,该报驻沪记者村田氏日前来访,要我做一篇关于我国新文学的趋向的文章。我得仿吾的帮助做了一篇‘Our New Movement in Literature’的短论寄去。我现在把他自译成中文,把初稿中有意未尽处稍补正以发表于此,我想凡为我们社内的同志必能赞成我们这种主张,便是社外的友人我们也望能多来参加我们的运动。”^①陶晶孙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的小说《黑衣人》,便是日文写成,后来才又翻译成中文发表的。陶晶孙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的小说《木犀》,也是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郭沫若回忆说,“我们在日本由几个朋友组织过一种小小的同人杂志,名叫‘Green’,同人是郁达夫、何畏、徐祖正、刘垠元、晶孙和我。晶孙这篇小说,便是‘Green’第二期中的作品;原名本叫‘Groire en destinee’(相信命运。)原本本是日本文,我因为爱读此篇,所以我怂恿他把它译成了中文,改题为《木犀》。”^②此外,还有将中国古代诗文翻译成外文的实践,如敬隐渔将唐朝诗人金昌绪的《春怨》译成法语,刊登在《创造周报》第十六号上。另外,也有将自己或同人的汉语创作翻译成法语或英语的实践,比如敬隐渔译郭沫若历史小说《函谷关》为法文,发表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对此,郭沫若曾回忆说,“敬隐渔是我的同乡四川人……我们在办《创造周报》的时候,他到了上海,住在徐家汇的一座天主教的学堂里面。他用法文翻译了我的《函谷关》和《鹄鹄》,都先后登在《创造周报》上,因此便时常到我寓里来。后来他竟成为了创造社的中坚分子,自己也写小说,仿吾是十分激赏的,曾夸示为‘创造社所发掘的天才’。”^③叶灵凤在回忆中也曾谈到过敬隐渔将自己的文章由法文译成中文的事:“敬隐渔是四川人,据说从小在四川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长大的。

①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附白》,1923年5月27日《创造周报》第3号,第15页。

② 郭沫若:《〈木犀〉附白》,1922年10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

③ 郭沫若:《一封信的问题》,1947年《人世间》第2卷第1期。

他是先学会了法文,然后再学中文的。后来不知怎样到了上海(也许是由于郭老的关系吧,因为郭老是四川人),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创作,这才同创造社诸人往还起来,并且也住在周报编辑部的楼上。他当时所发表的那几篇创作,还是先用法文写好,自己再译成中文,经过成仿吾先生润饰后才发表的。”^①这类译介实践虽然并不多,有些却很引人注目,除了有力地证明了创造社同人外语程度高明之外,还与现代文坛上许多文学现象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敬隐渔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译成法文后,罗曼·罗兰读后感动得流泪,由此还引发现代文坛关于罗曼·罗兰致鲁迅信件的有无得失等问题的争论。

在创造社同人的翻译活动中,还有古书今译的实践,如郭沫若白话译《卷耳集》,这也是创造社同人进行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在《古书今译的问题》一文中,郭沫若说,“整理中国的古代文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做群书索隐,都是很必要的事情,但是此外我觉得古书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且于不久的将来是必然盛行的一种方法。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难解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古书所用文字与文法与现代已相悬殊,将来通用字数限定或则汉字彻底革命时,则古书虽经考证,研究,标点,索隐,仍只能限于少数博识的学者,而一般人终难接近,于此今译一法实足以济诸法之穷,而使古书永远不朽。”^②对此,唐弢在《书话·译书经眼录》中说,“近于《文汇报》《笔会》中,读郭沫若《离骚》今译两章,热情奔放,不减当年。今人治古文学,不曰王母琼液,即曰冢中枯骨,爱之恶之,截然异趣。沫若远在一九二三年,于大家反对旧文学声中,即曾译《诗经》四十首,成《卷耳集》一册,由创造社出版,列为《辛夷小丛书》第二种,《辛夷小丛书》第一种名《辛夷集》,为沫若、均吾、仿吾、达夫等创造社同人的合集;第二种就是这本由沫若翻译《诗经》的《卷耳集》。”^③如果我们认可帕兹的观点,“当孩子向母亲询问某个单词的意义时,他其实是在要求她用简单的词把新词翻译出来。在这一意义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并没

① 叶灵凤:《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一封信》,《读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1页。

② 郭沫若:《古书今译的问题》,1924年1月20日《创造周报》第37号,第7页。

③ 唐弢:《〈诗经〉今译》,《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7页。

有本质的不同。”^①故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任何在译入语系统中以翻译形式呈现或被认为是翻译的文本都是翻译。”^②在上述意义上理解翻译,研究创造社翻译文学及译介实践,就不能忽视古书今译现象。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研究计划并保证研究的质量,在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选择上,我们不得不再加上另外一个方面的限定,即我们的研究工作关注的是创造社同人的汉译实践活动。

创造社同人的译介取材非常广泛,除了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译介外,还有文学批评、社会哲学、科学技术、经济与艺术等各种品类。这从创造社编辑的各丛书目录可略见一斑。一九二八年十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三期登载了创造社重新编号的《创造社丛书目录》,其中共列出了四十一种图书。其中,译介书目有:第七种,《沫若译诗集》;第八种,《查拉图斯屈拉钞》;第十种,《少年维特之烦恼》;第十一种,《银匣》;第十二种,《法网》;第十三种,《鲁拜集》;第十四种,《茵梦湖》;第十五种,《浮士德》;第十六种,《德国诗选》;第十七种,《雪莱选集》;第三十六种,《商船坚决号》;第三十九种,《磨坊文札》。除了上述各书外,还有“世界名家小说”:《杜莲格来》([英]淮尔特,原著,郁达夫译,一直未见出版),《沉钟》([德]霍特曼,原著,郁达夫译,一直未见出版),《鲁森堡之一夜》([法]葛尔孟,原著,郑伯奇译);“世界儿童文学选集”:《圣诞节歌》([英]狄更斯,原著,张资平译),《新月集》([印度]泰戈尔,原著,王独清译);“世界名著选”:《商船“坚决号”》([法]维勒德拉克,原著),《蜜蜂》([法]法郎士,原著,上海泰东图书局一九二四年六月初版时列为“创造社丛书”第十四种,又列为“世界儿童文学选集”第三种),《王尔德童话集》([英]王尔德,原著,上海泰东图书局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初版时列为“世界儿童文学选集”第一种)以上皆穆木天译。《虚无乡消息》([英]毛利斯,原著),《贫民》([俄]杜斯妥以夫斯基,原著);以上邓均吾译。李一氓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德]马克思,原著),《马克思昂格斯传》([苏]李阿萨诺夫,原著)。沈起予译:“社会科学丛书”之《社

① Paz, Octavia (1992)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Letters. In: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Guenette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p. 152 - 163.

② Toury, Gideon (1982) A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ndre Lefevere and Kenneth David Jackson (e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ranslation. Dispositio 7. Special issue: pp. 22 - 38.

会变革底必然性》([日]河上肇,著)……上述所列,仅是创造社译介活动中的冰山一角,为了突出创造社翻译文学及其译介实践方面的研究,科学、哲学、经济与艺术品类的译介,只能粗略梳理,细致具体的研究只能留待日后进行。

翻译(translation)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多层面的涵义:它既可以指总的研究领域(general subject field),又可以指产品(product),即翻译出来的文本(text),也可指翻译的过程(process),即译本生产的行为(art of producing),即“translating”。^① 在研究创造社的翻译时,基本也就围绕着“翻译”的三个层面展开,只是在进入具体的研究时侧重稍有不同。本书对创造社译介实践的研究既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传统的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的批评式研究,通过典型个案的剖析,研究创造社同人译介实践的得失成败及其历史经验教训。另外又借鉴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论,对创造社译介实践进行历史的、功能的和文化的描写与阐释,将创造社的译介实践活动放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其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功能。首先,本文拟完成的任务是系统地梳理并勾勒出创造社译介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各历史阶段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特征,与创造社相关或由创造社发动的翻译问题论争,在冲突与对撞过程中自身翻译特色和翻译观念的形成,主要解决创造社译介实践特色的形成原因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等问题,同时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探讨当时的文学准则和文化成规如何制约着译者的决策,而译者的译介实践活动又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当时的文学准则、文化成规及过渡期的文学文化发生影响。

按照翻译涉及的种种因素:原文的文化背景、原文、原文读者、译文、译文的文化背景、译文读者、译者,在翻译研究中侧重点的不同随之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翻译研究模式。“过去中国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很少涉及翻译活动如何在主体文化里面运作的问题。在这样的研究范畴之内,从事研究的人很难脱离‘原文’观念的限制,也因此绝少触及翻译活动所能产生的庞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译活动和主体文化间的互动关系……翻译是否能造成文化影响,又或是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其实并不在于语言转换的过程,而完全视其主体文化如何制约,又如何接受这个过程

① Jeremy, Mund,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NewYok and Londno: Routeldege, 2001, PP. 4

的产物,所以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于文本或翻译机制,而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面对中国翻译传统如此丰富的材料,实在让人有入宝山而空手的感叹。”^①孔慧怡所谈传统翻译研究的局限可谓切中肯綮,但强调翻译造成的文化影响“其实并不在于语言转换的过程”时,结论下得却又未免操之过急。语言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语言与思维的一致性,使得语言的转换本身便蕴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的因子。在我们进行翻译研究时,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间的融通问题,更有译者与原作者意图等问题的探讨。但是,除了译文相对于原著的忠实这一点外(其实这一点也很让人怀疑,到底什么是忠实,又是何种意义上的忠实等等,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即便是传统认定的误译和错译,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似乎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其他一些评判的标准也总是难免令人疑惑,正如王宏志所说,“当人们斥责这个翻译不像中文,那个翻译过于欧化的时候,他们的权威来自哪里?我们是不是要求每一位译者都只能以同一模样的‘中文’来翻译作品?如果真的是这样,阅读翻译作品还有趣味吗?作者或译者的个人风格哪里去了?‘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又从何谈起?早从‘五四’开始,便不断有人倡议,要建立中国现代白话,必须吸收各方面的养分(胡适 1935:25);就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出现的‘汉语规范化’运动及讨论,也从没有要求只能容忍一两‘种’中文书写模式,而是鼓吹要多吸收方言及外来因素来丰富现代汉语。一些被认为‘生硬牵强’的中文,不也可能是丰富现代汉语的元素?”^②错译、误译以及译得好坏的判断背后,不仅仅是原文与译文的对照问题,更有深层次的语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影响制约。当我们考察译文与原著的时候,往往预设了一个汉语的平台,将翻译研究中的某几个因素固定了下来,以之作为评判的准则。在创造社大量译介外国文学时期,现代汉语的平台尚未真正建构起来,其实真正的包含了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平台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固定地建构,评判的参照物本身就是人为建构出来的,研究的平台永远只能处于动态的变化中,这自然使得翻译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性。从现代汉语的生成及中文书写模式来说,从原文到汉语译文的“翻译”过程已不可考,而留给我们的,其实就是译文文本,因此,从翻译文学的角

①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度,也就是国别文学的角度,研究创造社翻译文学,从译文文本的传播接受进行研究,似乎比拘囿于忠实抑或叛逆更切实而有现实意义。

在进行翻译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试图像 Bassnett 说的那样,“不再说译者‘应该’或‘不应该’这样做。这种评价式的术语,只适用于教授语言的课堂上,那里的翻译,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狭小的教学用途。”因此,王宏志教授认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最少可从下列几个方面入手:(一)选材:什么样的作品给大量翻译过来?为什么这些作品会在这特定的时空受到垂青?这些作品有什么共同的特点?这些作品跟中国原有作品的分别在哪里?(二)译者:什么人当译者?他们的资历和背景是怎样的?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是怎样的?他们以什么途径取得这些认识?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人们愿意接受他们作为译者?他们为什么选择扮演译者的角色?他们要以这样的角色来尝试达到什么目的?(三)赞助人:什么人支持着这些翻译活动?他们以什么形式出现?他们的日程在哪里?这些日程跟他自己、跟译出语或译入语的社会和文化有什么关系?他们具备什么条件去扮演赞助人的角色?他们怎样制约着译者的活动?(四)读者:谁在读翻译作品?他们的资历和背景是怎样的?为什么他们愿意接受外来的思想及作品?他们如何对待翻译?他们期待从翻译中得到什么?这些期待对翻译造成什么制约?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五)社会/文化系统: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有什么特征?这系统的意识形态及诗学上的准则是怎样的?这些准则怎样制约翻译活动?翻译怎样融入及改变社会/文化系统?这些准则在受到翻译冲击后产生什么回应及变化。”^①我们在这里大段引用王宏志教授的文字,就是想以王宏志教授指出的方向作为创造社翻译文学及其译介实践研究的指导。在具体的翻译研究中,我们不可能解决上述全部问题,但是期待能够将上述问题灌注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

在文学译介的研究中,在关注译文与原著对等关系的同时,有必要将重心放置在译文及译文的接受者上,即关注原著如何被选择,译文又如何进入译入语文化并被接受,译介如何对译入语文化及语言等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将翻译研究的重心转向译者及译文接受者,有一个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研究者们的前面,即众多译本的甄别及其作为翻译与创作的关系问题。

^① 转引自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唐弢在《书话·译书经眼录》中谈到郭沫若译《茵梦湖》时说,“这本书有多种译本:商务印书馆有唐性天译本,书名作《意门湖》;开明书店有朱偰译本,书名作《漪溟湖》。朱偰在序文里指出唐译语句滞重,不堪卒读,‘实逊似郭译’。但郭译也有错误,并指出可以商榷之处凡十五条。最后,北新书局又有英汉对照本,为罗牧所译,序文中对郭钱合译之译文施以攻击,谓不可信。早期译者常持此种态度,实则所据原文不同,罗译既系英汉对照,根据英文本转译,实难据为信史。”^①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既有直接译,又有从第三方语言(甚至是第四方语言)的转译,而译介者又可能是许多人,而译介的形式又多种多样,诗歌翻译尤其如此,译文读者在何种意义上接收了原诗的信息,实是难以判断的问题,更何况译诗还是不是原语诗歌,这也很值得怀疑。当代诗人韩作荣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读过的只是译诗,我不知道,也怀疑这些汉语中的外国诗,是否是真正的域外诗。这让我想起美国诗人奥登的话,奥登读过译诗之后,不理解为什么曼德尔斯塔姆被称为大诗人,因为他从译诗中看不出其诗究竟好在哪里。我也想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曾被译为五言、七言的旧体诗和自由体新诗,先后在大陆出版,同时我也读过台湾诗人所译的《恶之花》,这三种版本读来差异甚大,我不知道哪一部更接近原诗,给我的感觉是三个波德莱尔,我无法将其统一在一个诗人的作品之中。”韩作荣进而认为,“用汉语译成的外国诗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外国诗,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是汉语诗歌的组成部分。对不懂外文或无法精通多种外语的人来说,其影响还是汉语本身带来的影响。”^②译本与原文的关系不足以解释翻译中出现的众多问题,将研究的对象转入译者及译文的接受者,也不能企望所有的翻译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决。另外,众多的译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些译本在什么意义上才是对同一文本的翻译,这些译本的优劣高下如何判定,读者对这些译本的反应差别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倘若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翻译研究的转向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上述问题虽然复杂而难以解决,却有一个扭结的点,即译文文本,将译文文本作为研究的基点,是创造社翻译文学研究的突破口。

二、创造社与中国现代文学翻译

初期创造社同人基本都是日本的留学生,而且在日本留学时间都比较

① 唐弢:《茵梦湖》,《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1页。

② 韩作荣:《诗歌讲稿》,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